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2.021

旧题新解, 创意迭出

——读罗新河《钱锺书文学思想研究》

刘年喜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9)02-0124-03

引用格式: 刘年喜. 旧题新解, 创意迭出: 读罗新河《钱锺书文学思想研究》[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4(2): 124-126.

岁末年初, 利用难得的寒假时间, 认真研读了罗新河教授新著《钱锺书文学思想研究》(以下简称罗著)。该书是新河教授在其博士学位论文《钱锺书文学思想研究》的基础上改写、扩充而来的, 其出版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其中一些成果已先期刊发在《文学评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文学研究》等核心期刊, 获得学界关注和好评。新河教授2002年攻读硕士学位时, 即对钱锺书文学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 历经十余年的勤奋耕耘, 他在“钱学”研究领域硕果累累, 新著《钱锺书文学思想研究》作为这一阶段研究的结穴之作, 从某种意义上讲, 也一举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这是一部堪称近年来“钱学”研究领域不可多见的力作, 其对钱锺书文学思想这一“钱学”研究中重头课题的研究蹊径独辟、极具创意, 在有关钱锺书文学思想的诸多重要论题上进行了饶有新意的阐发, 在以下三个方面对于推动钱锺书文学思想的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其一, 结合其学术旨趣、思想渊源、思想潜在之内在整一性和体系性, 对钱锺书文学思想的“非体系”特点作了令人信服之剖析; 其二, 通过视域拓展与理路创新, 弥补了之前钱锺书文学思想研究的缺陷与不足; 其三, 深入发掘“文学性”观念, 凸显钱锺书文学思想

对“五四”以来功利主义文学倾向的反叛和纠偏意向, 揭示其创新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 “非体系”特点的研究与剖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 随着《围城》《谈艺录》等的再版, 以及其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管锥篇》的出版, 钱锺书作为藏之名山的大儒被学界发掘, 成为比肩王国维、陈寅恪的学术大师, 甚至被人誉为“文化昆仑”。随着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兴起, “钱学”研究渐成为堪与“红学”“鲁迅研究”比肩的显学。不过, 誉满天下, 谤亦随之。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 一些学者开始对“钱锺书热”进行质疑和批判, 认为钱锺书研究“只是知识的积累, 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范式上并无建树”^[1], 钱锺书充其量只是一个优秀的学问家, 难以称得上是当代的文化大师; “在钱锺书身上体现着中国现当代学人的根本欠缺: 缺乏体系性建构的能力^[2]”, “钱锺书并没有为中国文化提供真正新的东西^[3]”。

无论是早期的《谈艺录》, 还是后期的《管锥篇》, 钱锺书的论著无一例外地选择用笔札体写作, 其外部结构形态自然也不是现代学术著作的那种章节紧密联系、环环相扣的体系性结构, 而是呈现出一种零散的、经验式的、随感式的、直感式

收稿日期: 2018-12-10

作者简介: 刘年喜(1966—), 女, 湖南双峰人, 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的面貌，这种著述形式在强调逻辑性、系统性的现代学界，不能不说是特立独行的，甚至是令人疑窦丛生的。与那些批评者不同的是，罗著通过对钱锺书学术生存内在理路考察后提出：“反对‘体系’，进行非体系化操作，在钱锺书那里是一种有原则、有方法甚至是有着哲学基础的高度自觉的意识和行为”^{[4]22}，钱锺书并非如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缺乏体系建构能力，恰恰相反，“非体系性是钱锺书对现代体系化学术操作潮流的反动而特意追求的一种结果。”^{[4]22} 追根溯源，钱锺书思想“非体系”特点之形成“源于其哲学理念上与西方近现代以来反传统、反教条、反体系的非理性主义的思潮紧密关联”^{[4]25}。同时，“也不能忽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对钱锺书学术理念创生的内在作用，中国古代的学术著作多数是零散的、经验式的、随感式的、直感式的。”^{[4]25} “这种著述方式作为一种传统，无疑以一种潜在的力量进入到了钱锺书的思想模式中，与西方的非理性潮流一起，共同构成了钱锺书学术方法论的宝贵资源。”^{[4]26} 在此基础上，罗著进一步提出，钱锺书的思想尽管在外在形态上呈现出非体系、非系统的状态，但如果从内在的、整体的、非线性视角来看，这种思想又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具有某种内在的整一性与体系性”^{[4]26}。这种内在的整一性与体系性，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即“整体论述构架——通观圆览”“论述内容的存在形态——网状结构”“主题、方法与原则的始终如一性”。至此，罗著对钱锺书文学思想“非体系”特点的来龙去脉作了令人信服的剖析，有力地驳斥了那种认为钱锺书欠缺体系性建构能力的观点。

二 研究视域的拓展与研究理路的创新

钱锺书文学思想博大精深，其文学观和文学研究方式，都打上了鲜明的个性印记。就文学观而言，其对文学本质、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接受都有极为独到、深刻的认识，但独树一帜的非体系学术实践方式，又使得其文学思想的外部呈现表现出零散的、非系统的状貌。这种独树一帜的著述方式，一方面顺应和还原了事物和现象的本真形态，另一方面也的确给人们的认知带来了不可避免的阻隔与困难。深入钱锺书文本，将其中处处珠玑而又自成一脉的文论碎片进行系统

化挖掘、梳理，总结为具有现代文论通行的体系性的理论构架，无疑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就其文学研究方式而言，钱锺书沟通中西、穿越古今，致力于各人文学科之间的对接和互文；他以文学审美作为立足点，广泛论述和涉猎包括美术、音乐、哲学、心理学、历史学、伦理学、文化人类学等人文学科各个知识领域，以求在一个跨学科的知识平台上，达到对人类文化的通观圆览，建立起自己融会贯通的文艺思想谱系。这样，其文学思想就不仅是跨文化的，还是跨学科的。对其文学思想的研究，就不仅仅关涉到文学批评与理论问题，还必然关涉到比较诗学、比较文化问题，且两者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从罗著之前的研究看，新时期以来对钱锺书文学思想研究论著甚多，文论方面的如胡河清之《钱锺书语言研究的当代文化意义》^[5]，高万云之《钱锺书修辞学思想演绎》^[6]，黄志浩之《钱锺书诗学研究的现代启示》^[7]，等等；比较方面的如赵毅衡之《〈管锥编〉中比较文学平行研究》^[8]，张隆溪之《钱锺书谈比较文学和“文学比较”》^[9]，许丽清之《钱锺书与英国文学》^[10]，等等。但深究这些论著的研究角度，不难发现，其并未实现文论研究和比较诗学研究的视野融合，而是将两者割裂开来、分别讨论，并由此为分界线，形成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和比较诗学研究两大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

为克服这种研究理路的不足，罗著独辟蹊径，以具体理论问题的探讨为立足点，将钱锺书之诗学观念与比较视野沟通起来，以求在论证上获得更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论著一方面深入文本，全面寻绎、梳理、总结其片段思想，建构为现代理论逻辑结构；一方面广泛参阅古今中外各种文化典籍，将其文学理念置于人类文化宏阔背景中进行参照、比较；同时紧密联系时代语境，回到其理论发生“现场”，考察其产生之意图、目的等。通过这三方面的研究，客观呈现钱锺书文学思想的整体面貌，揭示其贯通中西、横越学科的特点，阐发其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通过视野的拓展和理路的创新，罗著实现了对钱锺书文学思想更加宏阔、更加深入的整体关照和理论阐释，构筑起包含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在内的钱锺书文学思想理论框架，从而弥补了新时期以来钱锺书文学思想研究存在的缺

陷与不足,同时也以毋庸置疑的论述,驳斥了钱锺书缺乏体系建构能力和创造能力的论调。

三 “文学性”的阐发及其时代价值的发掘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一些学者对钱锺书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认为他欠缺体系性建构的能力;二是认为他只是传统知识的守成者,缺乏创造能力和现实参与意识,没能为现代中国文化建设提供新东西。罗著除了对所谓钱锺书欠缺体系性建构能力的观点进行反驳外,也对所谓钱锺书只是传统知识的守成者、缺乏创造能力和现实参与意识、没能为现代中国文化建设提供新东西的说法进行了辩驳。著作以钱锺书文学思想对审美性强调为线索,凸显其对“五四”以来功利主义文学倾向的反叛和纠偏意向,并借此揭示其创造精神和时代价值。罗著认为,出于独特的思想方法与审美选择,考虑到文学的复杂性,钱锺书并没有如现代多数文论家那样给文学下一个明确定义,他更多是从“文学性”这样一个特殊角度阐发自己对文学的基本观点,以避免文学概念的决定论与绝对论倾向。他一方面认为“文学虽无定义”,另一方面又强调文学“固有定指”。^[13]文学之“固有定指”即“文学性”,究竟应怎样理解呢?钱锺书将文学与社会文化系统沟通,显示其心理特征;将文学与哲学、历史、情感体验等进行联系、甄别,突出其形象性、虚拟性与情感性;将文学与禅宗、音乐、绘画等艺术门类进行比较、区分,强调其语言特征。可见,他对“文学性”即文学根本性质的论述具有强烈的审美意向性特征,这和现代文学中“五四”以来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形成鲜明对照;同时,他把文本视为审美价值结构,也和当时主流文论视文本为“载物”或“载道”之容器形成明显反差。将钱锺书文学思想置身于现代文学发展背景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对“五四”以来功利主义文学倾向具有自觉而明确的反叛和纠偏意向,显示出强烈的独立精神和批判意识。

“五四”运动以来,由于李泽厚先生所说“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背景,新文学几乎别无选择地成为民族救亡图存的载体和工具,功利主义文学观基本主导了现代文学的走向,功利主义文学倾向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相当一段历史时期,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功利主义文学观也并未消退,功利主义文学倾向还一度愈演愈烈。罗著认为,置身于“五四”以来功利主义文学倾向主导现代文学的潮流与走向的时代背景,钱锺书对文学审美性的维护和强调,显示出对“五四”以来功利主义文学倾向强烈的批判和纠偏意向;同时,其立足于中国现代性语境对文学审美性的阐释和伸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这一时期功利主义文学倾向的消极作用,凸显其文学思想的时代价值和社会参与意识。这种论述,也有力批驳了所谓钱锺书不过是一个知识的守成者,并没有为中国文化提供新东西的观点。

概言之,罗著立足于宏阔的研究视域,从钱锺书学术生存的内在理路出发,见微知著,洞幽烛隐,将其文本中处处珠玑而又自成一脉的文论碎片通过系统化的挖掘、梳理,整理成体系性的理论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钱锺书文学思想研究的缺陷与不足,学术价值不言而喻。这是一本近年来钱锺书文学思想研究难得一见的大著,值得学界重视与研究。

参考文献:

- [1] 蒋寅.在学术的边缘上:解构钱锺书的神话[J].南方都市报,1996-11-01(02).
- [2] 王晓华.钱锺书与中国学人的欠缺[J].探索与争鸣,1997(1):17-18.
- [3] 王晓华,葛红兵,姚新勇.偶像的黄昏:关于世纪末人文神话“钱锺书热”的对话[J].中国青年研究,1997(2):16-18.
- [4] 罗新河.钱锺书文学思想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 [5] 胡河清.钱锺书语言研究的当代文化意义[J].上海文学,1991(9):74-80.
- [6] 高万云.钱锺书修辞学思想演绎[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 [7] 黄志浩.钱锺书诗学研究的现代启示[J].甘肃社会科学,2005(1):15-19.
- [8] 赵毅衡.《管锥编》中比较文学平行研究[J].读书,1981(2):43-49.
- [9] 张隆溪.钱锺书谈比较文学和“文学比较”[J].读书,1981(10):134-140.
- [10] 许丽清.钱锺书与英国文学[D].上海:复旦大学,2010.
- [11] 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92.

责任编辑:黄声波